

新史学译丛

主编 蒋竹山

中国医药与 治疗史

(插图版)

[美]艾媿捷 [美]琳达·巴恩斯 编
朱慧颖 译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法曰將兒左掌向上
輕捏兒肘臂大由
中指朝上向外順捏
即食指仍搖二十回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本书涵盖了3000多年的医学史，展示了历代医学思想学派如何采纳新的实践、改变旧的实践，以及如何为回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偏离自己的思想和体制根源。本书考察了中西医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书中包含的信息非常广博以至于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但实际上这本书相当平易近人。作者假设读者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在一般背景信息介绍与具体医疗实践实例方面做了很好的结合，并运用直观图像（包括解剖图和从业者的照片）进一步补充说明了中医在多种背景和地理环境中的应用方式的多样性。通过对众多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的拣选，以及招募的50多位学者为此做出的贡献，巴恩斯和艾媿捷才得以创造出这本深入浅出的著作……《中国医药与治疗史》（插图版）可以作为学生、学者以及任何希望了解当代中国医学实践历史根源的人们的参考书。

——艾米莉·鲍姆，《洛杉矶书评》



啓真館

ISBN 978-7-308-19764-



定价：88.00元

中国医药与 治疗史

(插图版)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医药与治疗史: 插图版 / (美) 艾媿捷, (美) 琳达·巴恩斯编; 朱慧颖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1

(新史学译丛)

书名原文: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ISBN 978-7-308-19764-9

I. ①中… II. ①艾… ②琳… ③朱… III. ①中国医药学—医学史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72770 号

中国医药与治疗史: 插图版

[美] 艾媿捷 [美] 琳达·巴恩斯 编 朱慧颖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焦巾原

责任校对 张利伟 王 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62千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764-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总 序

蒋竹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副教授兼所长）

当代历史学新趋势：十个热门及前瞻议题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史学，这个时代新史学的变化应该算是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与“全球转向”。若细分的话，可划分为十个主题。

（一）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

近来史学界继“文化转向”之后，掀起一波对全球史的关注，有学者形容为史学界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全球史的视野提供了史家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取向，在课题上涉及了分流、合流、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帝国主义与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与传染、环境变迁等。全球史的研究取向并未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相反地，通过强调对跨越边界渗透至国家结构的行动者与活动的探索，全球史跨越了国家、地方及区域。然而，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提供给学者们一种更广及更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视野。虽然全球史在研究课题上是跨国的，但国家研究不该被抛弃，国家史值得根据全球化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民族国家的而进行再探。

全球史不意味着就是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而是该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课题中，带入全球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

几种模式，例如：（1）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2）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应；（3）探讨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4）探究“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在研究课题上，研究者可以透过全球视野，探讨本计划的十个主题，也可以就以下几个子题来思考其他议题，例如帝国、国际关系、跨国组织、物的流通、公司、人权、离散社群、个人、技术、战争、海洋史、性别与种族。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被过于夸大。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过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无疑地，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一种重要的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用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弃之不顾。民族国家虽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分析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提供给那些国家史研究者以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只是视民族国家史为一种特定历史。

此外，美国著名法国史学者林恩·亨特（Lynn Hunt）认为“全球史或新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提供给学者们一种更广及更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视野。1979年，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揭示微观史学与叙事史学的回归，近来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有意无意地仿效斯通的方式，也写了一篇《长时段的回归》（“The Retreat of the Longue durée”），似乎在暗示大历史与全球史时代的到来。阿米蒂奇认为，史家是众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更乐于左右转弯。在过去五十年间，美国内外的史学界出现过好几波历史转向。刚开始的变化是

社会转向：“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远离精英的历史，并转向普通人、平民、被边缘化或被压迫的人的经历。在这之后有了语言学转向，又可称为文化转向或文化史的复兴。

最近一波则是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全球史的再思考》（*What Is Global History*）所探讨的超越国别史的变化，例如跨国转向、帝国转向以及全球转向。在阿米蒂奇看来，在这些史学变化中，有些可能转向更好的方向，但有些人认为会朝更坏的方向转变。不管你是支持论者还是怀疑论者，不可否认地，“转向”这一词语包含了思想的进步。作为一位世界公民，我们不仅要跳脱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将自身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待，更要多加接触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历史的演变。

（二）帝国与国家：比较与关联的视野

人类历史的政治发展上，民族国家是常态，还是帝国是常态？事实上，帝国是古今中外最无所不在且最持续不衰的权力形式与政治单位。在新帝国史的影响下，过去的中心与边缘不再是固定的，值得重新思考传统帝国如唐、元在东亚与世界史中的新的定位与意义。透过域外文献来看明清帝国也是跳出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之一，比如，大量的《燕行录》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数据。传统帝国的课题除了关注边界之外，亦可从帝国内部的角度探讨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例如易代时期的士人际遇、忠义、遗民、文人书写等课题。

此外，研究者可以思考近代帝国的发展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及社会运动史的影响。更可以从帝国的框架来探讨技术与近代东亚发展的关系，例如：牛乳的使用，甚至母乳代用

品豆浆的出现；日本帝国殖民统治地区的蔗糖技术发展；又或者是肥皂、味精、农药的制造及其在东亚的流通与近代日本化学工业的密切关系。

近来新帝国史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结合世界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去思考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转变。例如 19 世纪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观点：“规训”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从卫生学、大众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不仅仅是培养精英阶层。帝国的规训既会带来普遍性的政策也会引起反抗，研究者可以将社会史与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所探讨的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加快现代国家的构建。研究帝国的历史，不该只是一个偏向一边的单方面的故事，永远只独厚一个声音，而是该把帝国看成一个充满互动的整体，一个内部互相关联的大世界。

（三）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快速成长的研究主题之一。许多研究主题受到“文化相遇 / 文化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方法论的影响，课题和以往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不同，涉及区域、文化边界与文化交往，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误解也成为这类研究的重点。此外，我们也看到学者有时会用“文化传译”（cultural translation）来置换或取代。

有关这个课题有两个重点分析方向，一是“他者”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建构，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针对欧洲人的自我建构的形塑。因此，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接触的研究中，文化的流向并非单纯地由欧洲中心转向地区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获致平衡观点的结果，强势的地区文

化该如何处理”。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学者认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相遇的研究，以及在过去与未来如何让跨文化的研究丰富历史学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方历史学方法论转向文化史的取径上做理解。此外，“相遇”（encounter）一词的深远含义，应该是指向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而这也应是我们对整个跨文化交流历史研究的期许。

这方面的课题有：图像与跨文化交流、人物流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史、贸易与知识交流、知识与帝国、博物学与物质文化。

（四）环境与历史

尽管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架构常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但有时还是会超越边界，将焦点集中在气候、疾病、海流、资源商品的流通。当我们开始逐渐关心全球气候变迁、稀有能源资源、生物多样性及干净的水资源时，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以往环境史较少关注的外交或世界史的视野上。

研究者可以关注全球环境史的议题，例如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环境史，例如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某个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约阿希姆·拉德卡（Joachim Radkau）、彭慕兰等人的著作。三是把环境史与世界史融为一体的著作，例如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英国环境史教授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及《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 (Alfred Crosby) 的《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四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研究，例如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 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弗雷德·施皮尔 (Fred Spier) 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此外，环境与历史关心的议题还有水资源、战争与环境、动物的历史、疾病与环境、能源、森林、国家与环境、工业化、污染等课题，亦可结合传统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制度、交通）、农业史（水利）的研究成果。

（五）科学、技术与医疗

除了医疗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取向之外，也可以参照“全球视野”的主题，探讨全球医疗史。医疗史学者哈罗德·库克 (Harold Cook) 认为如果我们借鉴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医学史。他认为关于植物学和医学的数据，以及针灸医术，都像商品一样，也会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入欧洲。贸易公司和传教机构促成人员、技术、信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说明了史学全球观的重要性，相对地，国家与“文明”并非主角。战争与医疗的课题，可探讨的有战争的危险、战争在医学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战斗人员的医疗照顾、战争与精神医学，以及战时平民的健康与照护。

受到新帝国史的影响，学者们也开始探讨殖民的脉络，拒绝中心与边缘的二分法，认为它不仅促成热带医学等新学科的发展，也影响了欧洲的实做与观念。我们探讨的课题有种族与医学、帝国与

疾病、殖民医学、热带医学、西方医学与开发中世界。

此外，近来科学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到技术史的层面，尤其是技术的历史与近代东亚社会现代性的形成之间的关联，例如日本帝国在近代殖民过程中的技术史就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其中如与公共卫生防治有关的除虫化学药剂的问世，或者是与食品卫生及健康有关的味精的制造，都与化学技术的变革及产业的推动有关。

（六）情感的历史

情感史的开展将历史研究的重点，首次从理性转到感性（爱情、愤怒、激情、嫉妒等）的层面，有学者认为这代表“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举例而言，性别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的史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兴趣，成了情感史的一个重点。当今史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各个单一的文化中，将情感的种种表现“深度描写”，找出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居高临下、品头论足。更有学者注意到了“情感的团体”，探讨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的情感表现差异。

有关情感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在2012年11月的“情感的历史研究”的对话专号。学界关注的课题有心理疼痛、抑制疼痛的阿司匹林与情感，以及近代生产的产育之痛。有的学者则以跨学科的方式讨论如何透过物质文化，例如纺织品、肥皂或绘画等来理解情感史，这部分可以参考2013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此外，战争与情感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透过爱、悲伤、憎恨与恐惧等情感，探讨与战争有关的修辞、经验与记忆的联系。

此外，可以探讨的重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电影与艺术中的情感再现、情感与记忆、情感与资本主义市场、身体与空间中的情感。这部分可以参考彼得·盖伊（Peter Gay）的关于19世纪资产阶级的五卷本研究，特别是《感官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这一册。研究者也可从情感延伸至感觉的文化史，例如嗅觉、味觉与听觉的感官历史，可参考法国史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的关于气味的文化史名著《恶臭与芳香》（*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在中国史方面，已有学者开始从历史角度，描述一个以情感为中心的都市群体如何从20世纪30年代的媒体事件中获得巨大的道德力量。为什么“情”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公众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情感、家庭美德及性爱等私人领域在国族、城市公众、现代公义理念、性别化的主体的建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只在近代，有关情的讨论可上溯到传统帝制时期的中国，例如明清帝国崇尚贞节，通过四处为节妇立牌坊、撰写传记、封赏家属乡亲的方式来纪念和弘扬妇女的贞节美德。而朝廷也通过对忠臣孝子的奖赏有效地表明，男性为孝而引起的悲伤和哀悼之情是可敬的情感形式。因而，在某些情境下，伦理情感比法律更具有道德优越性。例如有学者探讨晚期帝制中国时发现，朝廷在处理血亲复仇案件时，将孝行当作是豁免杀人罪的依据。

（七）历史记忆

法国史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曾说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与过去发生关联的感情只残存在一些“场所”中，他称为“记忆所系之处”。如何透过“历史与记忆”的课题来书写国史成为当代

史家关注的焦点。在法国史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见到“7月14日”、《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圣女贞德、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及“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等课题。记忆不仅是思念消逝的往昔，还是对自身主体的确认。怎样记忆？怎样忘却？记忆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如此不断扩散与互动，使得记忆由个体的变成集体的，在此意义上，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称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

研究者可以透过仪式、纪念物、纪念碑、博物馆、纪念馆、墓葬、公园、博览会、战争之旅等主题，研究如何透过地景或空间来记忆过去。此外，战争与记忆也是记忆研究的重点，可以探讨民众如何透过重要的政治与军事物品或个人的传记与日记，来记忆与见证战争的公与私领域。例如二战期间的重庆大轰炸、台湾空袭记忆，内战，或者是历史上有关战争与屠杀的课题（纳粹、亚美尼亚、非洲及伊拉克种族屠杀等）。又或者研究电影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形塑过去与再现历史事件？在塑造公众对过去的感知上，电影充当的是什么角色？此外，也可以从记忆与文化资产、记忆与日常生活、记忆与创伤等角度探讨历史记忆的课题。

（八）阅读、书籍与出版文化

阅读史与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强调阅读的“接受”问题。阅读史的界定一方面与写作史区隔，另一方面又与过去的书籍史（书籍商业史、书刊检查史）相比较。学者们注重研究读者的角色、阅读习惯的变化，以及印刷的“文化用途”。有的学者则探讨个别读者对文本的反应，还有学者通过宗教审判所审讯的回答来进行研究，甚至探讨阅读行为的改变，像是18世纪的“阅

读革命”。

研究者可以关注书籍史家较少关注的出版活动与书籍文化层面及其时代，像是图书出版与销售活动、旅行指南的书写及出版与旅游文化的关联性，甚至性别、阅读与出版的关联。像是2015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的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就颁给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何予明（Yuming He）教授。得奖著作是《家与世界：16—17世纪刻本中对“大明”的编写》（*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讨论的是晚明的书籍与出版文化。

此外，除了印刷文化外，传统中国在印刷术出现前的写本文化，亦可用来思考阅读与书籍的关系。

（九）大众史学 / 公共史学

史家约尔马·卡莱拉（Jorma Kalela）近来在《公共史学评论》（*Public History Review*）探讨了当代史家制作历史的新渠道，文章开头引用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一句话相当引人深思：“没有人拥有过去，也没有人可以垄断如何研究过去，或者是如何研究过去与现今的联系……今日，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在这个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历史已成为商品，历史消费者可以透过物质媒介接触历史。大众不仅可以透过学院史家掌握历史知识，也可以借由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的虚拟转向（virtual turn）与视觉转向（visual turn）接触历史，以及发展他们自己的叙事、故事及历史经验。

非学院或非专业历史——所谓的大众史学——是种复杂的、动态的现象。然而，史学界对与过往接触有关的大众史学，却缺乏全

面性的探讨。这常是因为专业史家不重视各种通俗历史，这从对大众的批判与强调上下层对立二分模式上可以看出。专业史家偏向以理论来讨论历史的角色与本质，以致大众史家以及通俗媒介对历史的理解，长期来一直处于边缘位置。

近来华文世界相继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大众史学，虽然名称用法不同，但都反映出这波学院史学之外社会实践走向的变化。研究者可以探讨的方向有博物馆、口述史、大众史家、学科发展、地方史、网络、影像、历史记忆、文化资产及出版市场等。

(十) 新史料与历史书写

新史料与历史书写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考古与新发现资料对古代史研究颇为重要。近来的新史料与历史书写的课题有：马王堆帛书、考古墓葬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研究，《里耶秦简》与秦代史研究（官制、历史地理、社会史、文书、邮驿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墓志与壁画，明抄本北宋《天圣令》《至正条格》与法律史研究，明清域外汉籍与跨文化交流研究。在近代史新史料方面则有“蒋介石日记”的开放。

除了考古数据与新史料的发现之外，数字时代的历史学的一大特色是数据库的使用，如何透过数据库的妥善利用进而发展出新课题与新视野，值得深究。近来各个图书馆与研究单位都在积极开发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例如，台湾“中研院”的“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内阁大库档案”“拓片典藏数据库”，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妇女杂志》《英华字典》，台湾“中研院台史所”的“台湾研究古籍数据库”“台湾日记资料库”，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文件折件全文影像数据库”。地理空间方面的数据库有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数据库”“台湾历史文化地图”。

目前学界透过这些数据库进行历史书写的例子相当多。除日记外，另外引起学界重视的是“申报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尤其是后者吸引许多学者进而利用数据库中的“关键词”研究“观念史”。报刊数据库也是近现代学者研究社会文化史课题的重要数据源，例如国外妇女史学者已经在利用“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数据库中的几种报刊《玲珑》《妇女杂志》来研究近代中国的性别史、社会文化史。

研究者可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探讨课题：数字数据库的挑战与可能、新技术与新文献、新数据与新叙事（日记、关键词）。除了数字化的数据库外，亦可以从新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着手，例如考古出土资料、政治外交档案等。

启真馆的“新史学译丛”即在上述的十个课题中，挑选出近来的重要著作进行翻译，第一批的主题有旅行、医疗、历史记忆、城市文化及科举考试。通过这些既有新视野又有新史料的作品，我们期待能为历史研究注入一股活水，进而开创出一些新的研究主题与方向。

致 谢

本书包含了诸多不同的文章、作者和插图，因此堪称为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如（按时间顺序）林大伟（Lim Tai Wei）、本杰明·王（Benjamin Wang）、凯瑟琳·郝（Catherine Hau）、索尼娅·迦勒特（Sonia Jarrett）、德鲁·格罗斯曼（Drew Grossman）、吴伊万（Wu Ifan）、杰克·贾（Jack Meng-tat Chia），协助我们组织、编辑本书，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尤其要感谢翟湘（Zhai Xiang）、皮特·拉威尔（Peter Lavelle）和西尔维亚·赵（Sylvia Zhao），他们非常仔细地审阅了书稿，找出了许多错误。尼伊·托特斯瑞（Nij Tontisirin）绘制了地图，米纱（Misha Kanai）和杰克·贾帮我们做出像样的表格和大事年表。在波士顿大学，织田惠美梨（Emiri Oda）、玛格·哥德斯基（Margo Godersky）和奥布里·魏斯曼（Aubrey Wissman）协助我们翻译和整理了参考书目。

不仅是马克·西姆（Mark Seem）和范家伟（Fan Ka-wai），法比恩·西蒙尼斯（Fabien Simonis）、爱德华多·库尼亚（Eduardo Cunha）也在编辑方面提供了及时、宝贵的建议。

许许多多的医生分享了各种有关中国的医疗传遍全世界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这些传统、文本、口头经验的传播和实践的生命力的延续。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他们非常重要，无法忽略，但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我们尤其要谢谢德文·蒂博（Devon Thibeault）和爱德华多·库尼亚（Eduardo Cunha）在家中一直不断给予的支持与耐心。